

The Earth-System Crisi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rxian View

John Bellamy Foster

University of Oregon, USA

Translated by YAN Tingjia ZHAO Jingj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10,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John Bellamy Foster. (2026). The Earth-System Crisi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rxian View. YAN Tingjia & ZHAO Jingjing (tra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03–11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1>

This article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of th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Graduat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titled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Dissemination Pathways of Production-related Folk Vocabulary in Bashu Dialects.

Abstract: The Holocene epoch in g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last 10,000–12,000 years has given way to a new geological epoch which natural scientists are calling the Anthropocene, marked by humanity's emergence as the main driver of change in the Earth system as a whole, threatening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a majority of ecosystems on the planet, and the human species itself. From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perspective, this planetary emergency constitutes a crisis of civilization. Human civilization arose in the relatively benign environment of the Holocene. In contrast, the Anthropocene is an epoch of increased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dangers, marked by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Great Climacteric, objectively requir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more sustainable society, 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making of such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long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x; Anthropocene; Great Capitalist Climacteric; metabolic rift

Source: Foster, J. B. (2017). The Earth-System Crisis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Marxian View.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7(4), 439–458.

Notes on the translators: Yan Tingjia is a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TI)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focusing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Email: yantingjia@stu.sisu.edu.cn. ZHAO Jingjing is a Doct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DTI) 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oral English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Email: melody121410@163.com.



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地球系統危機與生態文明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文

俄勒岡大學,美國

閻庭佳 趙敬敬/譯

四川外國語大學

摘要: 距今約 1 萬至 1.2 萬年的地質紀元全新世,已被自然科學家通稱的『人類世』新地質紀元所取代。人類世的核心標誌是:人類已崛起成為驅動整個地球系統變化的主導因素,這種趨勢不僅威脅著人類文明的前途,更危及地球上多數生態系統乃至全人類的生存。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審視,這場地球危機已然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危機。人類文明發源於全新世相對溫和的環境。到了人類世時代,地球便進入了一個生態系統持續緊張、環境風險加劇的新紀元。新紀元的核心標誌是所謂的『大臨界期』,呼籲人類構建一種更具可持續性的社會新形態:即生態文明。人類構建生態文明社會與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的漫長革命歷程密不可分。

關鍵詞: 生態文明;馬克思;人類世;大臨界期;代謝斷裂

基金項目: 本文系 2026 年四川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巴蜀方言生產民俗辭彙英譯策略與傳播路徑研究》(SISU2026XK201)的階段成果。

一、引言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地質史上的全新世已經被名為『人類世』的新地質紀元所取代。在此紀元中,人類日益成為改變整個地球系統的主導地質力量,其影響力遠超其他所有因素。這標誌著人類歷史步入了『大臨界期』,即一個紀元轉型的時代。從歷史社會科學視之,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文明危機或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全球性緊急狀態。倘若資本主義繼續按原有模式照常運轉,地球系統裂痕日益加深,其不僅會威脅作為先進有序社會形態的人類文明整體,更將危及人類自身及無數其他物種的生存條件^[1]。就此而言,人類世意味著一項前所未有的挑戰。

文明發端於全新世,其興起以定居農業和經濟剩餘的增長為先導,通常伴隨著文字的發展與以階級為基礎的城市社會的形成。歷史上,雖有部分區域文明曾在一定程度上因生態因素走向崩潰,但總體而言,全新世始終為高度有序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由資本主義發展催生的人類世則截然不同:它既引發了全球性危機,也提出了必須構建生態文明的時代命題,即轉向一個能夠實現實質性平等與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中國最為深刻的認識到了這一點,絕非偶然。盡管自身仍面臨深刻的生態矛盾,中國卻汲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遺產,在以悠久文明為文化動力之上,增添了唯物主義的革命視野。同樣不足為奇的

[1] Angus, I. (2016).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Kolbert, E. (2014). *The Sixth Extin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是,生態文明問題已成為 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議題,它深深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根基,並正催生一場全球性的生態社會主義運動。

要把握當代文明危機的歷史特殊性並回應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挑戰,必須從『大臨界期』的歷史條件出發。唯有如此,方可切實推進這一勢所必至的紀元轉型。同時需要認識到,這一轉型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道路抉擇密不可分,在本質上關乎生產的組織方式,即自然與社會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

進而言之,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審視生態文明,首要在於對『文明』概念本身持批判立場,認清其歷史的階級屬性及其與當下生態危機的內在關聯。談論生態文明的構建,便已指向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漫長轉型。

二、大臨界期

全球生態危機如今已成為人們老生常談的話題。然而,『危機』這一概念雖不可或缺,但僅憑其自身,遠不足以表達人類在人類世所面臨生態挑戰的全部嚴重性。世界正面臨一場曠日持久的地球系統緊急狀態,要求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社會代謝進行根本性轉型。人類世本身已被界定為地球系統中的『人為斷裂』,它同逾越行星邊界緊密相關,危及人類文明以及包括人類自身在內的無數物種^[1]。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審視,這便提出了社會環境轉型的問題,而要應對人類世的挑戰,這種轉型必須以革命性的方式加速推進。這樣一場生態與社會革命必然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它分階段展開,其間有前進,亦有倒退。這一轉型在社會環境關係層面的物質根源,早已在歷史進程中孕育,其基礎存在於資本主義以及更廣泛的階級文明的發展之中。

本文援引環境地理學家伊恩·伯頓(Ian Burton)與羅伯特·凱茨(Robert Kates)在 20 世紀 80 年代提出的『大臨界期』概念,用以指稱自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開始,人類與環境關係變化的社會方面。伯頓和凱茨形象地將托馬斯·馬爾薩斯 1798 年發表《人口論》的年份定為大臨界期的起點,並認為這一時期將延續至 250 年後的 2048 年^[2]。在這個意義上,大臨界期代表著整個社會或文明在生產關係和環境關係變動中所經歷的一個漫長轉型期。

正如他們所寫的『應用於全球範圍內的人口、資源與環境問題』,大臨界期這一概念『抓住了這樣一個時期的意涵:它是決定性的,可能發生嚴重的惡化,是一個充滿異常危險的時期』^[3]。以這種方式理解的社會大臨界期(但摒棄其馬爾薩斯框架),與人類世的出現是一致的,一般認為人類世發端於工業革命時期化石燃料的大規模應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加速』階段最終成熟。因此,大臨界期既代表著一場全球性緊急狀態,也意味著必須經歷一場社會歷史轉型,以重塑人類與地球系統的關係,使之符合可持續人類發展的要求^[4]。

鑒於世界經濟如今已達到如此規模,其正常運行,例如當前的能源使用形式,已足以威脅到整個地球系統生物地球化學回圈的穩^[5],顯然,必須在馬克思所稱的生產的『社會代謝』與『自然的普遍代謝』之間進行

[1] Hamilton, C. & J. Grinevald. (2015). "Was the Anthropocene Anticipated?"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 (1): 59-72; Wark, M. (2015). *Molecular Red: Theory for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Verso.

[2] Burton, I. & R. W. Kates. (1986). "The Great Climacteric, 1798-2048: The Transition to a Just and Sustainable Human Environment." In *Geograph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edited by R. W. Kates and I. Burton, vol. 2, 339-6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3] Ibid., p. 60.

[4] Burkett, P. (2005). "Marx's Vision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57 (5): 34-62.

[5] McNeill, J. R. & P. Engelke. (2014). *The Great Accele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gus, I. (2016).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某種調整,使社會朝著更具可持續性的方向發展^[1]。否則,地球系統本身必將把自身的限度強加於人類社會,導致文明的衰亡,並給我們自身及其他物種帶來難以估量的代價。

正如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Paul Sweezy) 1989 年所描述的『環境危機的總體性質』那樣:

『一種根本且日益擴大的脫節:一方面是現代全球經濟對環境施加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環境中蘊藏的自然力量滿足這些需求的能力。』^[2]

他把資本主義制度描繪成一頭不可阻擋的龐然大物,以資本不斷積累本身為最終目的。在擴張進程中,單個資本也受到其『制約』。

『這一制度本身就內含著創造性驅動力與毀滅性驅動力這兩股相互交織、極其強大的驅動力:創造驅動力與毀滅驅動力。這兩股驅動力遲早會變得相互矛盾、不可相容。而且,既然調節只能來自施加於自然的需求一端,而非自然承載這些需求的能力那一端,我們就不得不追問:資本主義在近幾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究竟有沒有任何跡象能使我們相信,這個制度既能遏制其毀滅性驅動力,又能將創造性驅動力轉化為一種良性的環境力量? 答案是否定的:歷史記錄中根本沒有任何依據能支撐這樣一種觀念。』^[3]

斯威齊認為,這相同的創造或毀滅雙重驅動力不僅適用於資本主義,也同樣適用於他所處時代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他進一步指出,後革命社會承受著效仿並趕超更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壓力,其對環境的影響幾乎難以與其資本主義對應體區分。然而,後革命社會並不具備同樣的破壞環境的內在驅動力,因為它們並非本質上受資本積累過程所支配^[4]。此外,計畫的存在,使得這類國家一旦將環境問題提升至首要社會議程,便更有可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這一論點指向了『大臨界期』的概念,但與伯頓和凱茨的表述略有區別。它要求在生產與地球之間重建某種均衡,從而超越勞動與自然的異化。不過,這種均衡不能被簡單地設想為一種靜態均衡,而應是一種共同進化或創造性可持續性的動態均衡。社會若不能突破現狀以構建這樣一種可持續的秩序,就只能逐漸招致災難^[5]。這對文明,甚至可能對人類自身及無數其他生命物種的生存都是一種威脅。目前只能通過構建一種過渡性的生態文明來尋求出路,其雖仍帶有階級社會的殘餘,但正邁向社會主義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三、對文明的批判

現代科學,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的現實背景下,不斷提出文明危機問題。正如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凱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指出的,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2℃ 已屬『超出危險範圍』;而在照常運轉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569。

[2] Sweezy, P. M. (1989a). "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 *Monthly Review*, 41 (2): 1-10.

[3] Ibid., p. 6.

[4] Sweezy, P. M. (1980).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5] Foster, J. B. (2011).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 *Monthly Review* 63 (7): 1-17.

模式下,氣溫上升 4°C(我們目前正朝此方向前進),這將威脅全球文明本身^[1]。他寫道:

『公開來講,人們普遍認為升溫 4°C 與任何關於有凝聚力、公平且文明的全球共同體的概念都不相容,超出了許多人心中的合理範圍。』^[2]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評估,4°C 升溫與全球文明不相容,倘若資本主義按原有模式照常運轉下去,到 2100 年全球平均氣溫可能上升高達 6°C。

從社會主義視角看,文明的生態危機最適合通過對文明的歷史批判來審視。這一批判由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夏爾·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引入社會主義理論,後經馬克思、恩格斯、威廉·莫裏斯(William Morris)等思想家進一步發展。『文明』概念最早出現於 18 世紀的法國,其核心含義源於與『野蠻』的對立。在當今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中,文明常被用來指稱人類發展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如『文字、數學、植物栽培和動物馴化』^[3]。在此意義上,文明的歷史前提是定居農業和經濟剩餘的生產。因此,作為人類一個發展階段的文明,與書面語言的出現、城市化、國家、階級分化以及私有財產的產生緊密相連。

傅立葉最廣為人知的貢獻是對文明的批判。他質疑了與文明最新階段,即如今的資本主義尤為相關的財產形式、生產與生產過剩、勞動分工、雇傭奴隸制、貧困以及父權制。在他看來,文明既代表著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更高階段,同時在諸多方面又是一種倒退,或者說是更高層次上的野蠻,因為它代表著一種更為劇烈卻又無政府狀態的生產與剝削形式。

傅立葉寫道:『人們已經很清晰地認識到了工業的惡性循環,以至於各方人士都開始對其產生懷疑,並驚詫於在文明社會中,貧困竟成為豐裕的產物』^[4]。喬納森·比徹(Jonathan Beecher)寫道:

『傅立葉對文明的批判絕對是包羅萬象的。在必要時,他能列舉出文明多達 144 種永久惡習,從工資制度的奴役到激發颶風及各類氣候極端事件,無所不包。』^[5]

因此,『文明』一詞在 19 世紀社會主義思想中既複雜又往往帶有貶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這種方式使用該詞,盡管他們常常用它來泛指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形態。正如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所言:

『馬克思於 1853 年得出結論:資產階級文明與野蠻密不可分。』^[6]

恩格斯認為早在古代社會,『文明』就『首先以其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為特征』。正是這一點造成了文明與環境之間社會新陳代謝的斷裂,而這一裂痕又隨著資本主義對城市無產階級的剝削而不斷加深^[7]。

在探討生態問題時,馬克思常常將其視為文明矛盾在更寬泛歷史意義上的反映,同時也具體體現了資

[1] Anderson, K. (2012). "Climate Change Going Beyond Dangerous—Brutal Numbers and Tenuous Hope." *Development Dialogue* September: 16–40.

[2] Ibid., p. 29.

[3] Childe, G. (1954).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4] Fourier, C. (1971). *Design for Utopia*.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5] Beecher, J. (1986). *Charles Fouri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 Beckert, S. (2015). *The Empire of Cotton*. New York: Vintage.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637。



產階級社會的矛盾。因此，他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論及森林砍伐時寫道：『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在破壞森林方面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養護和生產，簡直不起作用』^[1]。同樣，在論述土地覆被變化與荒漠化問題時，馬克思結合德國農學家卡爾·弗臘斯(Carl Fraas)的研究指出：

『當耕作任其自然發展而未受控制時……會在身後留下荒漠，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等地皆是如此。這再一次體現了一種無意識的社會主義傾向！』^[2]

蘇聯頂尖氣候學家費多羅夫(Fedorov)在評論馬克思關於弗臘斯的這段文字時寫道：

『這段話完全適用於當今許多研究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問題的西方學者。正如當年的弗臘斯一樣，他們認為自發演進的文化導致了社會與自然關係的危機，並且表現出某種社會主義傾向。』^[3]

費多羅夫在此所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初瀰漫於西方生態思想中，對資本主義及當代文明的隱性批判。當時人們開始認識到，馬克思早在19世紀就已揭示了人與自然整體新陳代謝中的深刻矛盾。

馬克思的代謝斷裂理論正是為專門分析工業化農業和城鄉極端分離所導致的人與土壤關係破壞而創立的。他指出，大規模資本主義農業逐步『擾亂了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進而『掠奪土地』並『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這樣一來，

『它造成了一種無法彌補的裂痕，因為這就破壞了生活本身所要求的、人和地球之間的物質變換的正常進程。結果就揮霍掉土壤的活力，而這種揮霍通過商業遠遠越出一個國家的範圍』。^[4]

對馬克思而言，這場新興生態大臨界期的關鍵意義在於，它破壞了此前一直保障文明發展的生產條件。應對這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趨於激化的文明危機，根本出路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馬克思指出，沒有任何個人擁有地球，即便是地球上的全體人類也不擁有地球；人類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受益者』，有責任作為『好家長』為後代悉心養護地球^[5]。

生態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廣泛威脅整個人類文化與文明。這種認識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愛爾蘭及愛爾蘭問題的著作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在分析1845-1846年愛爾蘭大饑荒時，馬克思將其部分歸因於土壤掠奪，而這正是殖民主義對代謝斷裂的破壞性加劇。

『肥料即土壤養分隨農產品和地租一同出口，土壤因此耗竭。各地饑荒時有發生，而由於馬鈴薯晚疫病，1846年爆發了全面饑荒，一百萬人餓死。馬鈴薯晚疫病源於土壤耗竭，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產物』。^[6]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322。

[2] Ibid., p. 558; Saito, K. (2016). "Marx's Ecological Notebooks." *Monthly Review* 67 (9): 25-42.

[3] Fedorov, E. K. (1972). *Man and Natur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919。

[5] 同上，頁878。

[6] 同上，頁141。

馬克思宣告：『愛爾蘭問題不僅是一個民族問題，更是一個土地與生存的問題。要麼毀滅，要麼革命，這就是口號』^[1]。在此，革命的根源不單是民族矛盾、殖民統治或勞動剝削；它指向一個根本議題：農民和農業勞動者的生態毀滅，這本身就是一種無意識的革命傾向。由此可見，不僅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場威脅整個文明的全面生態浩劫，同樣可以成為革命的基礎。

四、生態滅絕還是生態文明

20 世紀的生態與社會批評家繼承了馬克思對階級文明的歷史批判傳統，加之對全球環境破壞日益加深的認識，開始關注文明整體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生態威脅。劉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城市發展史》中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文明的存續，乃至人類中任何規模較大、未受重創的群體的存續，如今都已岌岌可危』^[2]。更早之前，他在《人的狀況》一書中便已寫道：

『當希臘、羅馬、中國或印度這些文明崩潰時，周圍還有文化水準大致相當的鄰邦，這種情況當今世界前所未有；而如果西方文明繼續走下坡路，它將把毀滅帶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3]

芒福德的文明觀源於社會主義思想中長期存在的歷史批判傳統，即認為文明本身是一種過渡性的、以階級為基礎的文化形態，其既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新的野蠻形態。正如他 1966 年在《機器的神話》中所寫：

『我給文明一詞加上引號……用以指稱最初在君主制下成形的一系列制度，包括政治權力的集中、階級的分化、終身式的勞動分工、生產的機械化、軍事力量的膨脹、對弱者的經濟剝削，以及為工業和軍事目的普遍推行奴隸制與強迫勞動，倘若沒有另一系列值得稱道的共同特征相伴如：文字記錄的發明與保存、視覺藝術與音樂的發展，早就使原始的神聖王權神話及其衍生的機器神話信譽掃地了。文明的這些負面制度之所以能延續如此之久，正是因為其積極成果雖被少數統治階級所壟斷，但終究服務於整個人類共同體』。^[4]

正是這種對文明的複雜理解，既承載著過去的集體文化遺產，又背負著野蠻、剝削與戰爭的異化遺產，為 20 世紀末那些直面全球性危險的最敏銳的社會主義生態分析家提供了思想基礎。

湯普森 (Thompson) 為抗議資本主義體制內在的核戰爭傾向和環境破壞，撰寫了《關於滅絕主義的筆記：文明的最後階段》一文。『滅絕主義』一詞被用來指稱『一個社會的那些特征在不同程度上體現於其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之中，這些特征將社會推向一個必然導致無數生靈滅絕的方向』^[5]。湯普森尤為關注核浩劫的危險，但他賦予這一概念更廣泛的內涵，使其同時涵蓋環境破壞。

這些深切的憂慮在巴赫羅 (Bahro) 那裏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他指出：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142。

[2]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3] Mumford, L. (1944). *The Condition of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4] Mumford, L. (1967).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Vol. 1 of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5] Thompson, E. P. (1982).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滅絕主義不僅指軍事過度殺傷能力、中彈，它指的是整個工業文明……湯普森關於滅絕進程日益加劇的不可逆轉性、關於人類最終的機能失調，即其徹底的自我毀滅的論述，從整體上刻畫了當前的局勢。

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表達這一滅絕論題，可以說生產力與破壞力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顛倒。與其他將文明作為整體來審視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看到了貫穿文明的血腥足跡，也看到了文明在身後留下荒漠。自從我們開始與自然進行物質生產交換以來，這種破壞性的一面就一直存在。今天我們被迫進行末日式的思考，這並非出於文化悲觀主義，而是因為這種破壞性的一面正在占據上風。^[1]

如今，關於文明可能崩潰的警告再度湧現，而且規模已不再是區域性而是全球性。這反映出人們日益認識到地球系統中存在著人為裂痕。然而，這類主流分析通常缺乏兩樣東西：對資本主義以及整個階級文明的社會歷史批判，以及對生態文明的構想。

戴蒙德 (Diamond) 在《崩潰》中談到，現代社會正加速走向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2]。他以帝國主義的論調聲稱，『第三世界』的一些社會已經在崩潰，真正的問題是這一趨勢是否會蔓延至『第一世界社會』。然而，戴蒙德對社會的分析是物化的，缺乏社會範疇和歷史範疇，更不用說階級分析了。在這種平面化的分析中，階級、勞動分工、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不平等這類議題通通缺席了。戴蒙德為大企業在環境問題上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強硬辯護，這一點最明顯不過地暴露了其分析中社會歷史框架的缺失。他想保全新自由主義文明形態，而他卻將其等同於文明整體。

這類標準的自由主義分析，與經典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文明本身是歷史的產物。我們既要在某些方面對其進行批判性捍衛，也要在另一些方面對其加以反對，最終目標是實現文明的歷史性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開篇便指出，人類面臨兩種抉擇：要麼『社會受到革命改造』，要麼『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3]。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人而言，答案永遠是革命的揚棄，不是文明的崩潰，而是文明的變革。

因此，與這一歷史唯物主義觀念最格格不入的，莫過於那種認為文明崩潰值得歡迎的觀點。例如，世界生態理論家傑森·摩爾 (Jason Moore) 就曾一再聲稱：

『一個使其近半數人口陷入營養不良的文明的崩潰，有什麼可畏懼的？5 世紀後羅馬的陷落，以及西歐封建權力的崩潰，為絕大多數人開啟了生活水準的黃金時代』。^[4]

某些自詡為無政府主義『反文明』的思想家甚至鼓吹建立一個先鋒隊，以暴力手段立即『推翻』文明本身。這種對文明崩潰積極面的強調，在當今時代，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必然會喚起全球文明災難性覆滅的幽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看，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是野蠻』^[5]，但這不能被曲解為我們應當將野蠻或災難性的文明衰落視為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可行間接道路。

正是在這裏，生態文明的至關重要性凸顯出來。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蘇聯生態思想經歷了一

[1] Bahro, R. (1994). *Avoid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saster*. Bath: Gateway Books.

[2] Diamond, J. (2011). *Collapse*. London: Penguin.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400。

[4] Moore, J. W. (2015a).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London: Verso.

[5] Luxemburg, R. (2004).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場短暫而充滿矛盾的復興^[1]。隨之而來的是,生態問題開始被界定為一個普遍的文明問題,這與經典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一脈相承,進而催生了『生態文明』概念本身,同一概念幾乎立即進入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如今,它在中國關於發展道路的持續討論中,發揮著極為突出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生態文明,意味著要努力超越所有先前以階級為基礎的文明的邏輯,尤其是資本主義的邏輯。這種邏輯的實質,就是自然的支配與異化、人類的支配與異化這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著名生態哲學家弗羅洛夫(Frolov)追隨馬克思,強調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是由勞動、生產過程以及科學所仲介的,因此取決於生產方式^[2]。哲學家洛斯(V. A. Los)提出需要構建一種新的『生態文化』或文明,在更可持續的基礎上重建科學技術與環境的關係^[3]。

因此,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看,新興的全球生態危機指向了生態革命和生態文明的客觀必要性,這是邁向生態社會主義的關鍵一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探討的生態矛盾遠不止土壤退化和城鄉分離,還涉及工業污染、煤炭儲量的枯竭、森林的破壞、食品的退化等諸多問題。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評論道,人類是『過去太陽熱的揮霍者』,正在耗盡煤炭以及其他自然資源^[4]。近年來,馬克思的代謝斷裂理論已被拓展應用於分析眾多領域:碳代謝(氣候變化)、海洋代謝、土地覆被、林業、火災管理、農業、食物系統等^[5]。該理論還被用於開展關於不平等生態交換、生態帝國主義及環境正義的分析。人類世本身在科學界已被描述為地球系統中的一種『人為裂痕』^[6]。

由此,我們正形成一種更為統一的認識:一方面看到了全球代謝斷裂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認識到構建過渡性生態文明的必要性。生態文明不能被視為對人類世大臨界期所帶來的巨大生態挑戰的一種簡單回應。相反,它要求在生產力、生產關係以及國家和社會層面進行深刻的變革。這是一場朝著成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規模轉變,必然要分階段進行。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實質性平等和生態可持續性為追求、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宗旨的社會形態,而這社會形態需要集體行動和計畫來支撐。

五、生態文明: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

文明從來不是西方的專利,也並非主要起源於西方。1974年,英國偉大的科學家馬克思主義者、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作了題為《西方反科學的東方視角》的演講。他評論道,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中,機械論科學對自然的支配,與人對人的支配是緊密相連的^[7]。這種聯系走向了它的辯證反面,在20世紀70年代催生了西方日益壯大的反科學思潮,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對此,李約瑟指出,革命的中國代表著另一種可能,其擁有一種異化程度更低、整體性更強的傳統。正如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早已指出的,中國科學儘管在某些方面相對落後,卻有一個鮮明特點:它含有『一種有機論的自然哲學……與現代科學在經歷了三個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之後,不得不採納的哲學極為相似』^[8]。因此在李約瑟看來,中國文明和中國革命,為人類開創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提供了希望的源泉。

[1] Foster, J. B. (2015b). "Late Soviet Ecology and the Planetary Crisis." *Monthly Review* 67 (2): 1-20.

[2] Frolov, I. T. (1983). "The Marxist-Leninist Concep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oblem." In *Philosophy and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ivilisation*, edited by A. D. Ursul, 34-57.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3] Los, V. A. (1983). "On the Road to an Ecological Culture." In *Philosophy and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ivilisation*, edited by A. D. Ursul, 319-39.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67。

[5] Wishart, R., R. J. Jonna & J. Besek. (2013). "The Metabolic Rift: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Monthly Review*. Accessed April 24, 2016.

[6] Hamilton, C. & J. Grinevald. (2015). "Was the Anthropocene Anticipated?"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 (1): 59-72.

[7] Needham, J. (1976). *Moulds of Understanding*. Aldershot, Hampshire: Gower House.

[8] Needham, J. (195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當然,自李約瑟作出這些判斷以來的四十年裏,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在當前發展道路上仍面臨嚴峻的生態和社會挑戰,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關係也充滿複雜矛盾。然而,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邁克爾·E. 曼(Michael E. Mann)等西方科學家,對西方經濟體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徹底失敗感到失望,越來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國。與其說他們從中看到了樂觀,不如說看到了希望^[1]。

在新自由主義西方應對氣候變化屢屢失責的背景下,一些西方科學家將中國視為氣候問題上的希望燈塔。這一點在著名科學史家奧雷斯克斯(Oreskes)和康威(Conway)2014年合著的《西方文明的崩潰:來自未來的回望》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這本書以2393年為背景,一位24世紀末的中國匿名歷史學家,在書中回顧了氣候變化如何導致西方文明及其資本主義社會的崩潰。最耐人尋味的是21世紀末的中國,與其他所有社會都不同,成功地以有計畫、有協調的方式作出了應對,如:應對海平面上升將人口向內陸遷移,從而保全了自己的人民和文化。

這種對計劃性和協調性的強調,解釋了為什麼儘管中國自身也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西方的科學家和科學史家仍願意將中國視為人類世生態轉型中一道希望的曙光。我們可以通過斯威齊1989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社會主義與生態》的文章,來進一步分析這一點。他指出:

『這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並非必然破壞環境,問題在於迄今為止,它始終未能超越其誕生的資本主義語境。如果未來有一天,社會主義國家能夠調整優先事項,不再以追趕和防禦資本主義為中心,轉而將環境保護與生態保全放在首位,那麼計畫體制完全有可能被改造,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正因如此,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能否挺過當前的危機,就顯得至關重要。這一點無法保證,但至少社會主義體制擁有一種潛力,一種受無限積累驅動的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具備的潛力。^[2]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在人類世和大臨界期日益嚴峻的絕望處境中,人們把越來越多的希望投向中國。斯威齊最擔心的事情部分成為了現實:絕大多數計劃經濟體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徹底放棄了社會主義。然而,中國雖然走了一條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卻始終沒有完全放棄社會主義目標,也沒有徹底拋棄計畫體制。在諸多重要方面,中國依然是一個後革命社會,深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影響,也因此充滿了各種矛盾特徵和多重可能性。

考慮到這一切,一個問題隨之而來:中國能否在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動下,再次實現重大變革?它能否在人類世問題上發揮全球領導作用?而作為全球霸權的美國,如今已經放棄了這一角色。還是說,中國已經深陷資本主義道路,兩極分化嚴重,根本無法調動底層社會力量,因而難以實現這一轉變?這些關鍵問題,目前還沒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民對這些挑戰的回應,將具有全球性的關鍵意義。

中國有著複雜而獨特的歷史,因此我們不必驚訝:儘管中國的首要目標一直是追趕西方的經濟發展水準,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極高的增長率,也引發了嚴重的環境問題。但與此同時,中國也著眼於未來,提出了『生態文明』的理念,並在將資源和技術轉向環境治理方面邁出了巨大步伐^[3]。矛盾的是,如今的中國正站在自身的關鍵轉捩點上。一方面,中國存在一些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正以如此迅猛之勢挺進替代能源的新世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中國能否在當前的生產關

[1] Mann, M. E. & L. R. Kump. (2015). *Dire Predictions*. New York: DK Publishing.

[2] Sweezy, P. M. (1989b). "Socialism and Ecology." *Monthly Review* 41 (4): 1-8.

[3] Seligsohn, D. (2015). "China's Climate Comeback." *New Scientist*.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830490-400-chinas-climate-comeback-how-the-top-polluter-is-cleaning-up/>.

係下,獨自成功完成向生態文明的轉型;而在於中國是否會成為全球生態革命的發源地之一。儘管中國自身存在諸多環境矛盾,但它已經旗幟鮮明地將構建『生態文明』作為一項國家戰略,而這一點,在世界經濟霸權核心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至今仍是空白。

人類歷史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上。正如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說:『人類文明很難在現有資本主義及其相伴而生的、極度衰弱的民主制度下存續』^[1]。因此,除了反抗資本主義及其主導的整個世界市場之外,人類別無選擇。當今地球系統緊急狀態的種種嚴峻事實不容回避,人類的選擇空間已經十分有限。歸根結底,要創建全新的、關乎人類命運的生態文明,全球範圍內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態與社會革命。鑒於全球南方經濟和生態危機的深重程度,以及當地人民反抗經濟帝國主義和生態帝國主義的鬥爭,這場革命最有可能率先在全球南方爆發。在資本主義大臨界期,人類的未來取決於全球範圍內一個新的環境無產階級的崛起。這個階級代表著當今絕大多數身處險境的人類,將為建立一個更具實質性平等、生態更可持續的世界提供革命動力。正如馬克思在 19 世紀所宣告的:『要麼毀滅,要麼革命』,這如今已經成為人類前進道路上的口號。^[2]

(Editors: ZOU Ling & JIANG Qing)

[1] Chomsky, N. (2015). *Because We Say So*.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 Books.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頁 400。